

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与早期羌文化探索^{*}

叶茂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从齐家文化起，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进入到青铜时代，而马家窑文化及之前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时间上，齐家文化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时间跨越约在夏代前后；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其早期分别约在距今3000多年，兴起于商代前后，都延续至较晚，有的约至周代了。沙井文化基本上处于东周时期。这些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中国远古历史大致可以对应起来，提供了探讨华夏民族和羌民族起源，探讨中华民族多源一体关系，探讨中华文明和羌文化的关系等学术课题的具有研究价值和重大学术意义的一个时空框架和古文化的系统。通过对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牙齿和西宁陶家寨汉墓出土牙齿进行的古DNA采样和测序分析，发现其人群在遗传结构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与现代人群比较发现，实验样本与羌族人群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早期羌文化可以上推到齐家文化时期。

关键词：河湟地带；古羌人与文化；喇家遗址；齐家文化；卡约文化

黄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是历史上羌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和羌民族的祖地，特别是青海的河湟流域地带，历来被认为是古羌人的发源地。羌人或羌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很古老的民族，羌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曾经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血脉中十分重要的一员，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发展，有过显著的贡献。因而，研究和探讨羌人的发展历史，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多民族融合发展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演化。甘青地区的史前考古学，对于探索古羌人和羌文化，探索中华民族源流，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甘青地区考古学的发展，也为这些诸多方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

甘青地区的考古学可以追溯到约近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现代考古学，起始于20世纪之初，来源于西方现代科学的西学东渐的思想文化的传播。西北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先驱是瑞典学者安特生，安特生在甘青一带的考古活动，开创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早期历史。安特生本来是当时北洋政府聘请的矿政顾问，他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后来转变成为了成绩卓著的考古学家。他曾经对于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店考古工作有过重要贡献，后又在河南渑池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对于中国史前考古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23~1924年，安特生在发现了仰韶文化之后，又调查和考察了中国西部黄河上游的

^{*} 本文是提交汶川首届“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高端论坛的论文，经修改和补充。本项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课题的支持。



甘青地区，这期间发现了多处史前文化的遗址，并且根据这些遗址和不同的文化遗存面貌，他首先命名了若干个文化期，排列出了黄河上游区域的史前文化的初步序列。这就是所谓的安特生的“六期说”^[1]。

这个六期说就是：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也就是后来在中国考古学上所著称的：齐家文化、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

除了一些史前文化的年代和早晚关系被他搞错了之外，而其中大部分他对于这些史前文化的基本认识，包括定名和文化内涵的认定，都是基本上客观的，是比较如实的。这些主要的认识，后来也多被中国考古学家们所认可，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新的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的证实和不断丰富。应该说，安特生的这些考古学开拓性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成果是显著的，也是值得学界给予充分肯定的。

在安特生的发现中，还有青海湟中的卡约遗址。安特生没有把卡约遗址作为一个文化阶段来认识，而是归入了寺洼文化。这个遗址的文化遗存，后来被中国考古学家定名为卡约文化。卡约文化主要分布青海的河湟区域，地望上就与古羌人有着不解之缘。

不过，在安特生当时“六期说”的认识上，他把齐家文化陶器比较朴素、未见彩陶，看成了时代上比较古老的一个特征，这是安特生出现错误认识的一个局限性的很重要原因。其实，齐家文化不仅有彩陶存在，而且年代也并不如他所估计的那么早。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表明，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处在马家窑文化之后与甘青地区诸多其他青铜时代文化之前。显示了齐家文化承上启下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对于齐家文化的年代，这是中国考古学家从一开始就敏锐注意到的，并且通过大量考古工作和众多考古发现的研究，不断获得了更充分和肯定的科学认识。

齐家文化还发现了青铜器和玉器，已进入到早期青铜时代。这就与安特生的估计相去甚远

了。安特生不仅在这些认识上存在误判，还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所谓“西来说”的观点，而他对于中国彩陶的来源的一些解释又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和强化了“西来说”的理论。特别是对于中国彩陶文化的所谓彩陶是外来的“西来说”这一说法，中国早期的考古学家一直就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当然也就更加在意安特生的发现和研究。

中国考古学界曾经一度对安特生及他的学说加以猛烈批判，把它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放在一起予以痛斥。这是中国学界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里，对于国外的理论，进行拨乱反正并矫枉过正的一种历史过程和政治现象。现在，中国学界已经回归到理性和客观实际的学术中来。近年来，关于安特生的早期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学界也已经有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把它放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去作如实的考察和客观揭示，充分理解安特生在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把安特生个人的品质和学术造诣，与他对于考古资料的认识局限和研究中的失误、时代的大背景和学者所受的影响以及历史观等，加以区分开，从而还他这个卓越的考古学者一个真实的学者身份和中国早期考古学开拓者的形象^[2]。

但是，考古研究表明，安特生当时关于齐家期认识上所犯的错误，其实只是一个低级错误。关于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齐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也是一个有明显相对早晚的地层现象的，今天的考古专业学生就可以轻易分辨这种现象。实际上在齐家坪遗址上就有齐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明显地层关系——在齐家文化堆积层中和地面上，都可以见到马家窑文化的少量的或零星的陶片，这种现象在许多齐家文化遗址上都广泛存在。但这个现象却被安特生忽略了。而他作了另一种解释：在齐家坪遗址表面发现一些仰韶陶片，说明仰韶人可能生活于齐家之后。所以说，他这是一个低级错误。

1945年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在甘青地区的考古调查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夏鼐先生在宁定县（今广河县）的半山墓葬区发现了齐家文化墓葬，并发

现在填土中混进去有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彩陶片（所谓仰韶期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确认了齐家文化晚于所谓仰韶期的相对年代关系，便从根本上改变了齐家文化相对年代的原有认识，提出了对齐家文化重新认识的新观点^[3]。而夏鼐先生的这个发现，是直接显示年代相对早晚关系的现象，为齐家文化年代的订正找到了证据。这个考古学年代的订正，也成为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可是，这个经典却一点也没有更多更复杂的思辨，仅仅只是一个考古发现的客观事实而已，而并不是重大发明。

另外，关于安特生在“西来说”上的干系，也不是像现在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他与此毫无关系或只是受了“西来说”的蒙蔽。实际上，安特生是很欣然接受“西来说”的。他没有在他的考古活动中，在黄河中游本地区去寻找更早的仰韶文化的来源，而是向西寻求西来的有可能的新线索，所以甘青地区成为了他在发现仰韶文化之后寻找的下一个目标。尽管当时西方流行的观点普遍都是倾向于“中国文化西来说”这种偏见，可安特生毕竟不同于其他西方学者，他是一个务实的科学家，也是一个与中国极为友好、待人友善、极少偏见的学者，本不应该受这种偏激观点的影响。但是，安特生确实是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因为他的“六期说”理论的提出，反倒更为“西来说”提供了一定理论的和实际的根据。客观上造成了支持、并进一步强化和加大了“西来说”的学术的分量^[4]。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学术研究回归理性，而把原本是安特生确实存有的错误和客观造成的不良影响也都一笔抹煞掉了，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安特生的研究应该是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复原。对安特生功过得失的评价，既不夸大，也不用掩饰。

二

学术界对于古代羌民族和羌文化一直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对古代羌人的研究，所涉及的面也较广泛，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都有许多

学者投入。在考古学上探索羌文化及羌人的起源，是考古学的学术任务之一，更是西北甘青地区的史前考古学与先秦考古学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

从考古学上去探索古代民族，需要具备较丰富全面的考古发掘资料，需要有比较深入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建立在完备的考古学序列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的脉络与清晰的古代文化系统之上，以及考古、民族、历史、人类学、文化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相互配合，进行严谨的考古学方法的研究探索和多学科协调。同时，在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和先秦考古的研究过程中，也是脱不开对于羌民族和羌文化的涉及和相关的探讨。

可喜的是，如今甘青地区考古学发展已经积累和具备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已经建立起了更加完备系统的文化谱系，有了进行族属研究探索的较好的有利条件。目前所知，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已有较广泛和较确定的一定分布范围和比较完整连续的文化系列。按照年代先后可以建立起来的文化序列能够早到距今七八千年，现在从编年上可以排定的序列是：大地湾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又称半坡文化）、庙底沟类型（又称庙底沟文化，在半坡和庙底沟之间还可以有一个史家类型）、仰韶晚期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又可分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不同的文化类型，其中半山和马厂类型又或被称为半山—马厂文化，或分别称之为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等。从七八千年连续发展至三四千年，甚至两千多年。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还存在不够清楚的情况，比如宗日文化、诺木洪文化，工作做得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不过大体上，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在年代的排序上，在文化的关系上，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确定的^[5]。而且已经有不少考古学家在对各史前文化族属问题展开了一定的讨论。

应该看到，在历史学和民族学上，关于羌人的研究已有很多学术的著述，如前辈学者顾颉



刚、马长寿、任乃强、当代学者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等，都有重要的文字著述发表和出版^[6]。历史学研究羌族史的成果可谓甚多，讨论也较广泛深入。而在考古学上，还是较简单地提出观点的居多，大多都是比较泛泛一说，有一定的简单化、表面化，真正对羌人和羌文化有深入探索的论述、有系统思考的研究，还并不多。

上世纪四十年代，夏鼐先生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在甘青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发掘了临洮寺洼山的墓葬，从而对寺洼文化有了较深入一些的认识。他第一次根据从古文献上关于羌族有火葬的记载中，对墓葬作了试探推论，提出了寺洼文化有可能是古羌人的文化遗存的观点^[7]。这大概是考古学家最早讨论古代羌人的著述。

夏鼐先生对于寺洼文化的推论，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推论。有学者认为夏鼐这个观点，是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后学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他对后学的影响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随后也可以看到，后来有许多考古学家，在讨论考古资料与羌人的关系时，多是沿用了比较简单化的倾向，甚至还有的是很简单的一两句话，就算是提出了某一种观点。实际上，如前面曾提到的，随后中国考古学家不少都已经认识到了西北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可能和史前羌民族相关。不过，这些许多认识，大致说来主要都还是较为泛泛的讨论或甚至仅仅是推测，普遍缺乏细致深入的严密探究。

真正从考古学上，有目的、有意识地对羌文化、羌民族与考古学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应是俞伟超先生。俞先生在用考古学方法探索羌文化的研究上用力很大，有卓越的贡献，是真正从考古学上进行羌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学术实践者。从俞先生的论述开始，才有了一个较为明确肯定、更为可靠的考古学上的早期羌文化。

俞先生的论述是兼顾了考古学和民族史两方面，充满了理论的思维和考古学的观察，不仅历史文献研读比较深入，更强调使用考古学的方法，而且特别注意到了考古学文化上的相互关

系，顾及到考古文化上的系统性。

还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俞先生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到青海进行考古教学实习，通过观摩考古发现资料和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俞先生意识到青海考古发现的卡约文化等系列资料，可能是羌文化的源头。这是考古学关于羌人起源探索上具重要进展的标志。俞先生在青海发表的两篇关于青海和甘青地区古代文化族属探讨的论文，都是在青海作了考古学观察与思考之后，在青海省做的演讲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他的这些研究思考。俞先生的这两篇重要的论文，最先都发表在青海省考古学会的内部会刊上，之后又都收入了先生的论文集，同时也收入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论文集^[9]。

1981年，俞先生的《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在青海省考古学会和青海省历史学会的报告会上所作的演讲，明确提出了卡约文化是羌人的文化。在之前的1979年，俞先生就曾在所作报告中发表了《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中，较清晰地系统梳理了这些不同称谓族群的关系，认为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等都是羌人的文化。还讨论到了青海西宁附近的汉墓，认为其中包括了汉、羌融合的现象。俞先生还乐观地预计，今后关于羌人和羌文化的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俞先生之外，其他学者也都陆续发表过一些关于羌文化的观点。目前看来，考古学家对于早期羌文化和羌人早期历史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现资料的丰富，也还会有进一步的完善和进展。在俞伟超先生之后，现在对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学的诸青铜时代文化的族属，考古学家们多倾向于可能是与羌人有关的一种认识，但是在具体的看法上，各方观点又有不尽相同。

其中主要的观点大致可归纳如下几种：1、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各文化都是不同支系的羌文化^[10]；2、认为从马家窑文化开始就是羌文化的先驱^[11]；3、宗日文化发展到卡约文化才是羌文化的主要源流^[12]；4、肯定卡约文化为羌文化的

源头^[13]。关于羌人和羌文化的研究，也还有其他的某些思考。比如唐际根就指出，若要证明商卜辞中的“羌”究竟是泛指还是专称，可以采集殷墟王陵区若干次商代“祭祀活动”的人骨以及西部地区的人骨标本，对其作锶同位素和氧同位素试验对比，通过比较分析后或可以得到确认^[14]。

关于古羌人和羌文化，在考古学上的探索，虽然有些不完全一致的认识，然而很多观点都是可取的，歧义并不大，基本取向近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细节的研究上，又还存在某些不确定性，尤其古羌人与现代羌族还有较大发展变化，问题显得相对更复杂。

三

俞伟超先生的研究和提出的重要观点和论述，是关于羌文化在认识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也可看作是一个新起点。它不该是妨碍继续研究探索和认识发展的路障，因为俞先生自己的观点也是前后有发展的。在考古学新发现资料不断积累的新条件下，我们的认识就应该随之再向前跨步和发展。

在考古学上关于羌文化的认识，分歧还是有很多的^[15]，当然也还存在某些不足，需要进一步继续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对于羌人白石崇拜的理解就有过于片面化和随意的倾向，如认为石棺葬是白石崇拜的现象。其实，石棺葬和白石崇拜毫无关系。但是，羌人的白石崇拜，可以认为就是一种石崇拜。石崇拜是比较广义的，而白石崇拜则比较狭义。从广义的石崇拜到狭义的白石崇拜，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石崇拜与灵石崇拜、白石崇拜，都具有原始宗教的某种含义。考古学家应该从考古发现和历史现象中，去追寻羌文化和白石崇拜之间演变的脉络和某些随时代而变化的现象，但应避免简单或随意的倾向。

我们推测，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序列来看，依据原始宗教广泛的石崇拜现象，就可以找到从“石崇拜 - 玉崇拜 - 灵石崇拜 - 白石崇拜”的这么一个现象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齐家文化时期盛行玉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大多有

发现玉器的现象^[16]；前齐家文化的诸文化却是玉器比较缺乏的现象；后齐家文化的诸文化又是玉器衰落的现象；这些现象可能解读为一个石崇拜变化的现象。它在与羌文化相关的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中，似乎表现得比较明显和突出。这也使我们从中获得了一种文化现象上的关联因素。

最近多年来，我们在青海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使得近年关于齐家文化的考古资料越来越丰富和引人注目，人们对于齐家文化的研究思考也在步步加深。至今，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发展，让我们掌握到的新资料也随之有了可喜的新变化。

比如，关于喇家遗址发掘出土的羊骨，据最新的研究进展，通过数量统计的方法，所知其中出土的最多的动物骨头，经鉴定都是属于羊的^[17]。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齐家文化时期无疑已经是在大量饲养羊群，羊这种家养动物，可能已经成为西部的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先民们相当重要的经济动物和一种经济支柱。对于古羌人来说，羊显然是最为重要的物种，也是最具有民族性意义的一种精神和物质文化的表现。羌人离开了羊，就无从谈起为羌。那么，在齐家文化时期，是否可能已经进入到了畜牧或放牧羊群的生产状态呢？畜牧是可以肯定的了，而放牧，还有待今后进行更多发现和研究的工作。不过我们已经通过喇家遗址的研究意识到，齐家文化牧业和农业发展的可能有一个特殊现象^[18]，值得注意。

现今，齐家文化时期的气候环境的研究，也在进行着重要的工作并且也初步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和研究进展。目前科学家普遍认为，距今4千年前后时期，在世界范围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温事件。大范围的降温，使畜牧业经济和放牧有可能转变成为了一种越来越具有重要性的经济成分的业选择。齐家文化正好距今约4千年左右，对齐家文化遗址的采样分析也大体印证了这时期气候显著波动和全球变冷。这对农业是不利的，却成为了中国畜牧业经济和随后的游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明显的契机。齐家文化后期，由于气候变化，在逼迫农业维持发展的同时，畜牧业成分就变得越来越偏重，尤其是羊的饲养增加，森林的



退缩，草地的增加，随之出现牧羊就是一种必然——气候和经济在发生着显著变化。

尽管齐家文化的考古资料目前仍普遍表明，齐家文化遗址许多还是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并以种植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甚至后来的其它青铜时代文化也还有如此的表现。然而也无可否认，其中的畜牧业经济成分也是在不断增加，这个变化的经济现象，正好可以说明和反映出，齐家文化时期的气候和经济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喇家遗址发生的自然灾害，也突出地说明了环境变化的强烈^[19]。

新近，现代科技考古也开始涉足古羌人的研究领域。在人类遗传学研究中，古DNA分析的科学证据也支持了齐家文化与羌人的相对亲密的关系。

喇家遗址发现的人骨，都采样进行了古DNA分析比对，这些资料，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获得关于灾难中的人们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的确认，同时提供我们进行遗址群之间血缘和地缘关系研究的资料和某种参考。但是无意中这些资料却给DNA研究者和学界提供了进行人骨的族属研究和羌人族源系统研究的重要依据和资料。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古代DNA实验室，曾经对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提供的齐家文化出土人骨的牙齿进行古DNA测序和分析，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果。而最近他们又对青海西宁陶家寨汉墓M5家族墓葬出土的若干人骨的牙齿（包括14个体）进行了古DNA采样。经DNA测序和分析，发现其人群属于古代本地土著发展过来的汉、羌融合的特征，该人群的DNA与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人骨的DNA相近，认为“在遗传结构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与现代人群比较发现，实验样本与羌族人群有较近的亲缘关系”^[20]。这项研究表明，DNA样本其遗传特征上与古代羌人的遗传特征密切相关，这是对于史前的和古代的羌人研究的最新科学资料和遗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从遗传学的科学证据上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数据和可以参考的重要信息。

综上所述多方面新的证据，在俞伟超先生研

究的基础上，我们试作进一步的发展，提出我们最新的认识：如果不拘泥于某些历史文献的记载，而是按照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新的事实，早期羌文化，有可能从俞先生认为的卡约文化再往前提，我们现在似可以初步确认，齐家文化是古代羌文化形成的时期。齐家文化之后，分化出了不同青铜文化的羌文化的不同支系，成为诸羌系。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就同时还可以认为，齐家文化之前的马家窑文化等诸前齐家的文化，都有可能是先羌文化，是孕育羌文化的一个历史阶段或羌文化酝酿的时期。再从考古学观察，仰韶等文化向西的扩大和演进发展，逐步形成了华夏的大系统，羌文化是传统的黄河文化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在西部融合演化而分化出来的族群，本质上说，羌应该是华夏群体中的一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成分。

注释：

- [1]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乐森瑛译），《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5年。
- [2] a.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第77~168页，三联书店，1997年；b.马思中、陈星灿编《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专刊系列，第十五号（中英文双语版），第104~125页，2004年。
- [3]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第101~117页，1947年。
- [4]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第87~133页，三联书店，1997年。
- [5]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
- [6] a.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b.马长寿：《氏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c.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d.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
- [7]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田野考古学报》第四册，第71~137页，1949年。
- [8]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188页。
- [9] a.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1期，1979年；b.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又

- 载《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第127~137页和第98~109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0]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229~23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 [11]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1期（创刊号，1979年），第2~13页；《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第127~13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2] 闫璘、徐红梅：《宗日遗址石棺葬文化族属探讨》，《丝绸之路》2009年第12期。
- [13]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又载《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第98~109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4] 唐际根：《商代的羌——中国古代的“边疆民族考古”研究一例》（会议论文，待刊）；郭物：《2009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论坛会议纪要》，《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5日第7版。
- [15] 谢端琚先生就综述和罗列了约十余种不同的观点，参见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227~237页。
- [16] a.叶茂林：《齐家文化的玉石器》，《考古求知集——96 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51~2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b.《齐家文化玉器研究——以喇家遗址为例》，《玉魂国魄（三）》，第141~148页，燕山出版社，2008年；c.叶茂林：《史前玉器与原始信仰——齐家文化玉器一些现象的初步观察与探讨》，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南艺学报》第1期（创刊号），2010年。
- [17] 这个重要的资料，是喇家遗址考古报告中的鉴定研究的一部分，承蒙本所考古科技中心的动物考古学家袁靖、吕鹏先生将这一初步研究成果奉告，特致谢意。喇家遗址考古报告待刊。
- [18] a.叶茂林：《齐家文化农业发展的生态化适应：原始草作农业初探——以喇家遗址为例》，《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b.叶茂林：《齐家文化研究相关的现实意义——纪念齐家文化发现90周年》，《2015 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
- [19] 夏正楷等：《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科学通报》2003年第11期。
- [20] 李胜男等：《陶家寨墓地 M5 号墓主线粒体 DNA 片段分析》，《自然科学进展》2009年第11期。

（上接第39页）

员墓葬位置统一规划排列。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南、北地区出现差异，北方地区受政治、民族融合等因素影响，家族墓地延续性多有改变，且变化较大。南方在南京以外的地区保持了家族墓地持久的稳定性，但也吸收了中原地区唐墓的若干元素而呈现出新的地方特色。^[6]铁鬼坪墓地南朝至唐代墓葬形制的变化，以及家族墓地在延续前代风格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变化，正好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下连州地区社会结构发展的面貌。

发掘：柏宇亮 刘锁强

绘图：钟振远 樊庆平

摄影：邹池根

执笔：柏宇亮

注释：

- [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乳源泽桥山六朝隋唐墓》，第95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 [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县博物馆：《广东和平县晋五代墓葬的清理》，《考古》2000年第6期。
- [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丰城洪州窑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 [4] 《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第1130页，中华书局，1974年：“桂阳太守，汉高立，属荆州，晋惠帝元康元年度江州。”《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第1619页，中华书局，1975年：“桂阳，汉县，属桂阳郡，今州理是也。隋开皇十年，于县置连州，大业改为熙平郡，武德四年，复为连州，皆以桂阳为理所。”“旧领县三，户五千五百六十三，口三万一千九十四。天宝，户三万二千二百十，口一十四万三千五百三十二。”可见唐初期连州人口增长较快。
- [5] 同[1]，第225页：“刘宋时期的湘州三郡，人口增长明显，郡县变化微弱，显示新、旧居民融合程度较高，新聚居区多依附于旧有郡县，‘侨旧’势力既无法排斥新民，新民也无力形成新的郡县。”
- [6] 沈睿文：《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墓地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